

海南闽语“枚”的来源与发展*

沈 冰 林华勇

[提要] “枚”是海南闽语中一个特殊的量词，出现在数量结构和有定量名结构中，呈现出与普通量词不同的特点：“枚”作量词对名词的数目有限制；有定“枚+名”结构中，“枚”有两种不同的语音形式等。邻近临高话的量词 $mɔʔ^8$ 与海南闽语的“枚”语音形式、功能十分相近。本文先描写“枚”的用法，在此基础上将其与临高话的 $mɔʔ^8$ 进行比较，认为海南闽语的“枚”来源于与临高话的接触，而后发生了自变。

[关键词] 海南闽语 临高话 “枚” 语言接触 演变

一 引 言

海南闽语存在一个特殊的通用个体量词“枚”，不管是其语音表现还是用法，都区别于普通量词。本文以海口话^①为代表来进行考察。海口话的“枚”有两种读音： $mɔ^33$ 、 $mɔ^55$ 。作量词一般读成 $mɔ^33$ ；出现在有定量名结构中，可读为 $mɔ^33$ 或 $mɔ^55$ 。例如：

- (1) 蜀枚[$mɔ^33$]包子（一个包子）
- (2) a. 枚[$mɔ^55$]苹果无好食。（这/那个苹果不好吃。）
b. 食[$tsia^{33-335}$]枚[$mɔ^33$]苹果去。（把那个苹果吃掉。）

与海口话邻近的临高话存在一个通用量词 $mɔʔ^8[mɔʔ^55]$ ，其表现与“枚”相似。例如（刘剑三 2009:143）：

- | | |
|--|-----------|
| (3) lan ² mɔʔ ⁸ hə ³ | 一个房子 |
| 房子 个 | |
| (4) dən ⁴ mɔʔ ⁸ kian ² kian ³ xəi ² . | 这/那个门刚刚开。 |
| 门 个 刚刚 开 | |

* 本文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“清末民国汉语五大方言比较研究及数据库建设（22&ZD297）”的支持。本文部分内容曾在“粤港澳大湾区中文前沿论坛”（华南师范大学 2020.11）、中山大学中文系现代汉语及语言学教研室讨论会上宣读。匿名评审专家提出宝贵的修改意见。在此一并致谢。

本文海南闽语发音人信息为：WSM，女，1990 年生，定安县龙河镇；HYH，女，1987 年生，文昌市铺前镇青龙村；LTX，男，1991 年生，万宁市和乐县乐群村；FJL，女，1997 年生，陵水黎族自治县新村镇城坡村；CLN，女，1991 年生，三亚市崖州镇港门乾隆村；CN，男，1991 年生，乐东黎族自治县佛罗镇佛中村；SR，女，1991 年生，东方市感城镇感南村；SHB，男，1983 年生，昌江黎族自治县昌化镇昌城村。临高话发音人信息为：LLY，女，1963 年生，临高镇马袅镇；LF，女，1970 年生，临高镇马袅镇石堂村。

① 海口话属闽语琼文区府城片，为本文第一作者母语。文中记音以海口市琼山区府城街道的语音为准，未标明出处的语料主要来自自然语料录音整理，也包括作者调查、自省的例子，所有语料均经核实。海口话语料尽量使用本字，本字不明的用同音字或俗字替代，如“枚”。

“枚”在海南闽语特别是海口话中，使用频率非常高，研究海南闽语的学者在不同程度上都关注到了“枚”。陈鸿迈（1992）、符其武（2008:315、348）根据读音，将其视为两个不同的词：“枚[mo³³]”与“奸[mo⁵⁵]”；张惠英（1996）认为“奸”与“枚”是同一个词，根据声调的不同区分功能上的差异。不管是“枚”还是“奸”，都是记音字^①。我们赞同张惠英（1996）的观点，统一记作“枚”。不同读音的“枚”，分别用“枚³³”“枚⁵⁵”加以区别。本文对“枚”的用法进行描写，并将其与临高话的 mo⁷⁸ 进行比较，探讨其来源以及特殊用法的形成。

二 “枚”与 mo⁷⁸ 的用法

（一）海口话“枚”的用法

1. “(底[di³³]哪/指+) 数+枚³³+名”结构

“枚”在“数+量+名”结构中，只能读作 mo³³。海口话有两个通用个体量词：“枚³³”和“个[kai²²¹]”。我们通过“枚³³”与“个”的对比，来展现“枚³³”的特殊性。

与数词搭配的情况。“枚³³”仅限于同语义数量为“一”的数词“蜀[ziak³]”搭配；“个”与数词搭配对数目没有限制。例如：

(5) 蜀个/枚³³苹果（一个苹果） 两个/*枚³³苹果 三个/*枚³³苹果

概数词“几”表示大于一小于十的数量，语义数量大于“一”，不能与“枚³³”搭配，量词“个”没有此限制。例如：

(6) 去买几个/*枚³³包子转来。（去买几个包子回来。）

此外，“几”与“夥穉[(u)a³³toi²⁴]多少”相同，还可作询问数量的疑问代词。“枚³³”同样不能出现于询问数量的问句中。例如：

(7) 即带有几/夥穉个/*枚³³苹果？（这里有几/多少个苹果？）

“枚³³”“个”都能出现在“底[di³³]+数+量”与“指+数+量”结构^②中。当数词为“蜀”时，不管与哪个量词搭配，“蜀”均须省略；若数词不是“蜀”，则不可使用“枚³³”。例如：

(8) a. 叫底(*蜀)个/枚³³去？（叫哪个去？）

b. 叫底两个/*枚³³去？（叫哪两个去？）

(9) a. 即/许(*蜀)个/枚³³是烂个。（这/那个是烂的。）

b. 即/许两个/*枚³³是烂个。（这/那两个是烂的。）

与名词搭配的情况。“枚³³”“个”与名词的搭配范围较广，均可与有生或无生名词、具体或抽象名词搭配。例如：

(10) 蜀个/枚³³依/房/想法（一个人/房/想法）

有些名词如关于钱数的表达，只能与“个”搭配，不能与“枚³³”搭配。例如：

(11) 蜀个/*枚³³银（一元钱）

无界的事物，如“水”，不能与“枚³³”“个”搭配，一般只能用临时量词。例如：

(12) 蜀盅水（一壶水） *蜀个/枚³³水

一些有界名词如动物类名词多用专用量词“只”，不能与“枚³³”“个”搭配。例如：

^① “枚”为明母蟹摄灰韵合口一等字，与海口话 mo³³、mo⁵⁵ 音韵地位不合。本文的“枚”为记音字。

^② “枚”出现在“指+数+量”结构中，可读为 mo³³ 或 mo⁵⁵，新派通常读成 mo³³。

- (13) 蜀只牛（一只牛） *蜀个/枚³³牛

2. 重叠及受全称量化词修饰

海口话的量词可以重叠，如“个个、条条、句句”等；也可与全称量化词“每”搭配，表周遍义。但“枚³³”不能重叠，也不能与“每”共现。例如：

- (14) 个个/*枚³³枚³³总是败个。（个个都是坏的。）
 (15) 每个/*每枚³³总是败个。（每个都是坏的。）

可见，“枚³³”与“个”虽然都是通用个体量词，但二者的用法存在差异：“枚³³”的计量功能有限，对名词的数目有要求，只能与数词“蜀”搭配，不能与语义数量多于“一”的语素如“两”“几”组合，不可与询问数量的疑问代词“几”“夥穧”共现，不能重叠，也不能与“每”共现；“个”没有这些限制。综上，量词“枚³³”的使用限制较多，而“个”的使用限制较少。据此，本文把“枚³³”视为特殊量词。

3. “枚+名”结构

海口话的量名结构可表有定，出现在句首其前字无须变调；位于非句首时，前字需变调，前字在原调调尾后增加一个调值为5的短调（参见沈冰 2021）。有定量名结构可独立使用，也可受其他成分修饰，可作主语、定语、同位语、宾语。例如：

- (16) a. 本[6ui²¹]书无见喽。（这/那本书不见了。）
 b. 条[diau²²¹]衫个衫领尻尻脏。（这/那件衣服的衣领很脏。）
 c. 白白[6ε³³⁻³³⁵]双鞋是伊买去我个。（白白的那双鞋是他买给我的。）
 d. 《张文秀[tiu³⁵⁻³⁵⁵]》本戏但顾好望。（《张文秀》那部戏非常好看。）
 e. 我想去买[vɔi²¹⁻²¹⁵]条衫。（我想去买那件衣服。）

量名结构作宾语时可表有定或无定，通过前字有无变调来区分。如例(16e')的“条衫”表无定，前字“买”不变调。

- (16) e'. 我想去买[vɔi²¹]条衫。（我想去买一件衣服。）

有定“枚+名”结构与普通的有定量名结构表现不同。“枚+名”结构表有定时，“枚”有 mo³³、mo⁵⁵两种语音形式，分别记作“枚³³+名”（A式）、“枚⁵⁵+名”（B式）。不管是在变调规律还是在语义类型上，A式、B式与普通量名结构都存在差异。

变调规律。A式不能出现在句首；位于非句首时，仍需依靠前字变调表有定，变调规则与普通量名结构相同。例如：

- (17) a. *枚³³苹果无好食。
 b. *枚³³房个窗帘尻尻脏。
 c. 白白[6ε³³⁻³³⁵]枚³³袋是伊买去我个。（白白的那个包是他买给我的。）
 d. “家明[mej²²¹⁻²²⁵]^①” 枚³³名无错。（“家明”那个名字不错。）
 e. 我想食[tsia³³⁻³³⁵]枚³³苹果。（我想吃那个苹果。）

B式的句法分布与普通有定量名结构基本相同，但不管处在什么句法位置，B式的前字都无须变调。例如：

- (18) a. 枚⁵⁵苹果无好食。（这/那个苹果不好吃。）
 b. 枚⁵⁵房个窗帘尻尻脏。（这/那个房间的窗帘很脏。）

^① 海口话的阳平字单字调长度较长，变调规律是在本调221的平调部分后增加调值为5的短调。

- c. 白白[6ε³³]枚⁵⁵袋是伊买去我个。(白白的这/那个包是他买给我的。)
- d. 伊[i²⁴]枚⁵⁵侬无错。(他这/那个人不错。)
- e. 我想食[tsia³³]枚⁵⁵苹果。(我想吃这/那个苹果。)

但是，B式只能出现在有定环境中，“枚+名”结构作宾语表无定时，只能使用A式。如例(18e)中“枚⁵⁵苹果”只能表有定，表无定只能说成“枚³³苹果”。例如：

- (18) e'. 我想食[tsia³³]枚³³苹果。(我想吃一个苹果。)

语义方面。与位于非句首的有定量名结构相同，A式可与表近指的“即这枚”对举，仍带有远指距离义；而B式无距离义，不能与“即这枚”对举。例如：

- (19) a. 我想食[tsia³³⁻³³⁵]碗汤，无想食即碗。(我想喝那碗汤，不想喝这碗。)
 b. 我想食[tsia³³⁻³³⁵]枚³³苹果，无想食即枚。(我想吃那个苹果，不想吃这个。)
 c. *我想食[tsia³³]枚⁵⁵苹果，无想食即枚。

具有唯一性语义的专有名词，可进入B式，不能进入A式。例如：

- (20) a. 昨晡[vau²⁴]枚⁵⁵日头但顾毒。(昨天太阳特别毒辣。)
 b. *昨晡[vau²⁴⁻²⁴⁵]枚³³日头但顾毒。

我们将表有定的“枚+名”结构与普通量名结构进行对比，可看出：普通有定量名结构位于非句首时前字须变调，带有远指距离义；位于句首各成分无须变调，不带有距离义。有定“枚³³+名”(A式)只能出现在非句首，须靠前字变调来表有定，也带有远指距离义。有定“枚⁵⁵+名”(B式)无距离义，且不管位于任何位置，其前字无须变调。

(二) 临高话 mɔ?⁸ 的用法

临高话包括临高、澄迈和琼山三个土语(张元生等 1985:13)。临高话内部普遍存在量词 mɔ?⁸(琼山土语为 mɔ²)，通常译为“个”。下面以临高土语的 mɔ?⁸ 为代表描写其功能。

1. “名词+mɔ?⁸+数词”结构与“数词+mɔ?⁸+名词”结构

mɔ?⁸与数词组合时，对数词没有要求；与名词组合时，只能搭配无生名词，不能与人、动物等有生名词组合。名词“人”通常使用量词 na³，动物名词一般使用量词 hu²。例如：

(21) tian ¹ mɔ? ⁸ he ³	一个箱子	vən ³ mɔ? ⁸ vɔ ³	两个村子
箱 个 一		两 个 村子	
(22) ɲa ³ na ³ /*mɔ? ⁸ len ¹ hun ²	五个人	(23) tam ¹ hu ² /*mɔ? ⁸ ɲu ²	三只牛
五 个 人		三 只 牛	

2. “名+mɔ?⁸”结构

临高话的量词可位于名词之后，构成名量结构表有定。有定“名+mɔ?⁸”结构作主语可独立使用，也可与其他修饰成分一起使用。例如：

- (24) dən⁴mɔ?⁸kian²kian³xəi². 这/那个门刚刚开。(刘剑三 2009:143)
 门 个 刚 刚 开
 (25) hoŋ²hoŋ²sou⁴ki³mɔ?⁸xək⁵sə³mai². 红红的这/那个手机非常好。
 红 红 手机 个 非常 好

“名+mɔ?⁸”结构还可作宾语，可表有定，也可表无定。通过语境来区分，无语音形式上的区别。例如：

- (26) hau²kən¹ma²vian¹mɔ?⁸in¹vɔi³. 我把一/这/那个杨桃吃完了。
 我 吃 杨桃 个 完了

临高话的“名 + mo⁸”结构无距离义，与海口话“枚⁵⁵ + 名”（B式）一样，可修饰独一无二的事物，且不能出现在对举语境中。例如：

(27) xu²fa³mo⁸leŋ²leŋ²kə². 祈求天灵灵。(刘剑三 2009:168)

求 天 个 灵 灵 的

(28) *hau²tiaŋ³kən¹mak⁸siŋ⁴nia⁴mo⁸ha³, m²tiaŋ³kən¹mak⁸siŋ⁴mo⁸.

我 想 吃 橙 子 这 个 一 不 想 吃 橙 子 个

3. 重叠

mo⁸可以重叠，表周遍义。例如：

(29) ma²fən⁴mo⁸mo⁸tsuŋ³en³. 每个龙眼都甜。

龙 眼 个 个 总 甜

三 “枚”的来源与发展

(一) “枚”的来源

关于“枚”的来源，前人研究主要有三种观点。一是中古同源词遗留说：张惠英（1996）认为海南闽语中的 mo 与临高话的 mo⁸ 同源，本字都是“物”。二是合音词说：钱奠香（2002:14）认为屯昌话表定指的“坯”（即“枚⁵⁵”）是远指代词“许”与量词“枚³³”的合音词，但未说明“枚³³”的来源。三是借词说：符其武（2008:315、348）认为量词 mo（即“枚³³”）来源于临高话，“名词前缀” mo（即“枚⁵⁵”）也源于壮侗语，但未展开详细讨论。

以上有关“枚”来源的观点存在以下问题：首先，临高话与海南闽语是否有亲属关系，目前尚无定论，故关于“枚”“物”同源的观点论据不足；其次，关于“枚⁵⁵”是合音词的说法，不符合屯昌话等海南闽语的语音规律（具体论证见下文）。“枚”呈现出了一系列区别于普通量词（如“个”的特点，可见并非海南闽语本身固有的语素。我们认为，海口话的“枚”来源于临高话。理由如下：第一，从“枚”的语音形式 mo⁵⁵ 来看，与临高话的 mo⁸[mo⁸]⁵⁵ 十分相近。第二，从功能分布看，“枚”的部分功能与临高话的 mo⁸ 相近。为方便比较，根据上文的相关描写，我们将“枚”与 mo⁸ 的功能整理如表 1 所示：

表 1 海口话“枚”与临高话 mo⁸ 的功能比较

语素	可与所有数词搭配	与名词搭配		可重叠	有定“量名” / “名量”结构
		无生名词	有生名词		
海口话“枚”	—	+	+	—	+
临高话 mo ⁸	+	—	+	+	+

从表 1 可看出，与 mo⁸ 相比，“枚”在功能上的限制更多，表现更为特殊，如仅限与数词“一”搭配、不能重叠等。一般来说，借词用法通常受限。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迁移的方向应是：临高话→海口话。海口话另有量词“个”，也限制了“枚”的使用。

第三，从“枚”的分布与使用情况来看，“枚”目前只见于临高话与海南岛的闽语。除临高话外，海南岛的其他民族语如黎语、村话中均未见该语素。与海南闽语具有发生学关系的福建、台湾、粤东等地的闽语，甚至是与海南闽语关系最近的粤西（茂名、雷州等）闽语，

都未见使用相关形式。海南岛内、外的其他汉语方言（儋州话、军话、迈话、吴语、粤语、客家话等），也未见“枚”的使用。我们进一步调查“枚”在海南闽语中的分布与使用情况，发现其使用主要集中在北部^①。具体参见表2：

表2 “枚”在海南闽语中的分布与使用情况^②

方言分区	方言点	“数+枚 ³³ +名”结构 (限与数词“一”搭配)	“枚 ³³ +名” 结构	备注
北部西片	海口(府城)	mo ³³	mo ⁵⁵	
	定安(龙河)	mo ³³	mo ⁵⁵	
	屯昌	mo ³³	mo ⁵⁵	“两/三+枚”有虚指的用法，表量少
北部东片	文昌(铺前)	—	mo ⁴²	较少使用“枚+名”结构，一般要加上指示词
	琼海(加积)	mo ³³ /mo ³³	mo ⁵³	
北部	万宁(和乐)	—	mo ⁴²	使用频率低
东南片	陵水(新村)	mo ⁴²	mo ⁵³	“枚+名”仅出现“枚+依”等几个固定搭配
南部东片	三亚(港门)	—	mo ⁴⁵	出现“枚+依”，用在负面评价、詈骂中
	乐东(佛罗)	—		
南部	东方(感城)	—	mo ⁵⁵	出现“枚依”等零星用法
西片	昌江(昌城)	—		

从表2可看出：①“枚”作量词主要出现在海南北部。南部的通用个体量词是“个/只”，北部存在通用个体量词“个”，而“枚”的用法特殊，与普通量词差异大。这些表现说明，“枚”不是海南闽语所固有的，“个”或“只”可能才是海南闽语固有的通用个体量词。②各地基本上都存在有定“枚+名”结构，北部东片及西片此种用法十分发达；北部东南片为过渡地带，存此用法，但使用频率较低；南部“枚”的使用更少，仅见于几个固定短语，不可类推，如“枚依/物”，且该词多用于贬损、詈骂等语境。从总体上看，“枚”的功能大致呈现出从北部西片到南部西片逐渐萎缩的态势。这与刘新中（2006）、辛世彪（2013）等相关考察一致。一些特殊的语音、语法现象，主要出现于海南北部的闽语。而临高话正好主要分布于海南的西北部，毗邻海口。可见“枚”的地域分布及功能发展的不平衡，与临高话的影响范围有关。

综上，我们大致可断定，“枚”是闽语传播到海南岛并与当地的民族语临高话发生接触后，才借入的成分。根据“枚”在海南各地闽语的使用情况，我们猜测“枚”的借入与发展，主要分两个阶段完成，形成了不同的层次。第一阶段：临高话→琼北闽语。琼北闽语从临高话中借入语素“枚”。这个阶段最早借入的很可能是 mo³³ 出现在“名+mo³³”结构中的用法，因为此功能的发展最成熟，分布范围最广。借入海南闽语后，语序调整成“枚+名”。第二阶段：琼北闽语→琼南闽语。“枚”从临高话借入后，在海南闽语内部扩散，扩散顺序大体为：北部西片、东片→北部东南片→南部东片、西片。南部东片及西片的发音人普遍反映，“枚”为外地音，并明确指出海口、琼海等北部地区用得最多。在与这些方言点的海南人交流时，

^① 为能细致考察“枚”在地理上的分布情况，本文参考辛世彪（2013）的做法，将海南闽语分成“两部四片（北部西片、北部东片及东南片和南部东片、南部西片）”进行考察。

^② 除屯昌（钱奠香 2002）、琼海（杨望龙 2019）以外，其他方言点的使用情况由笔者调查所得。

会受对方的影响选择使用“枚”。语言使用者的态度是影响语言接触的重要社会因素之一（Thomason & Kaufman 1988:39）。我们认为这种语言使用态度与心理，恰恰揭示了“枚”从北部往南部扩散的原因和途径。北部闽语区经济、政治、文化更发达，对南部闽语有较大影响。南部的“枚”极有可能是通过词汇扩散的方式传入的，且南部的“枚”多与名词构成具有特殊语用色彩的短语。“枚”的扩散始于有特殊语用需要的、有标记的结构，符合标记理论，即“标记总是先在标记项上出现，然后才在无标记项上出现”（沈家煊 1997）。

（二）“枚”的形成与发展

“枚”在海口话中表现特殊，主要体现在：量词“枚”出现在数量名结构中只能读成 $mō^3$ ，且仅限与数词“一”搭配；有定“枚+名”结构有两种类型，与普通有定“量+名”结构的差异较大。虽然来源于临高话，但“枚”的表现与 $mō^8$ 并不完全相同。下面尝试探讨“枚”特殊用法的形成及其发展。

1. “枚”的语音表现与数目限制

“枚”在“数量（名）”结构中，仅限与数词“蜀”搭配。而临高话数词“一”和 $mō^8$ 搭配时，也较为特殊。 $mō^8$ 与数词组合时，不受数词的限制，但数、量、名词的组合顺序与数词“一”有关。当数词不是“一”时，语序为“名+数+量”或“数+量+名”。例如：

(30) lan ²	tam ¹	$mō^8$	tam ¹ $mō^8$ lan ²	三个房子
房子三	个		三 个 房子	

临高话的数词“一”有 it^7 、 $hə^3$ 两个形式。当数词为“一”时，语序为“名+量+ $hə^3$ ”或者“ it^7 +量+名”。 $hə^3$ 必须出现在名词、量词之后， it^7 出现在量词、名词之前。例如：

(31) lan ²	$mō^8$	$hə^3$	$it^7mō^8$ lan ²	一个房子
房子个	一		一个 房子	

$hə^3$ 在语流中常弱化成 $ə^3$ 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在临高话 3 个土语中， $mō^8$ 与 $hə^3/ə^3$ 普遍出现了合音甚至是词汇化的现象。例如临高土语：

(32) $mō^8ə^3 > məə^3$	一个	(梁敏、张均如 1997:45) (临城)
个 一 一个		
(33) kan ⁴	$mō^8ə^3 > kan^4 məə^3$	一个瓶子 (王花 2015:62) (新盈)
瓶子个	一 瓶子一个	

根据梁敏、张均如 (1997:104)，在澄迈土语中，当表示事物一个数量单位时，量词也会跟数词 $a?$ “一”构成合音。琼山土语没有与 $hə^3$ 或 $ə^3$ 相当的数词。量词 mo^2 与“一”以外的数词搭配时读为 mo^2 ；当数词为“一”时，用量词变调的方式表示，个别量词还会同时改变元音，如 mo^2 变读为 mu^5 。 mu^5 在琼山土语中已词化，隐含数词“一”。例如：

(34) zan ²	mu^5	一个房子	(梁敏、张均如 1997:103) (龙塘)
房屋	一个		

临高话的数词 it^7 为汉借词 (刘剑三 2009:18)， $hə^3$ 是固有词，“名+量+ $hə^3$ ”是临高话的固有结构。普遍存在的合音语素 $məə^3/mə^3/mu^5$ ，一定程度上可反映出量词 $mō^8$ 与数词 $hə^3/ə^3$ 结合之紧密、使用频率之高。而这些特点，为语言接触的发生与合音语素的借入提供了可能性。临高人在学习闽语的过程中形成了有着母语干扰的中介语，将 $mō^8$ 以及 $mō^8$ 与数词 $hə^3/ə^3$ 的合音语素，均带到了海南闽语中，从而导致海南闽语的“枚”存在两种读音。以临高土语与海口话为例，其对应关系为：

临高土语		海口话
mɔʔ ⁸ [mɔʔ ⁵⁵]	—	mo ⁵⁵
mɔə ³ [mɔə ³³]	—	mo ³³

在海口话中，一部分阴入字白读舒化自成一个调类，形成“长入”调（陈鸿迈 1996:5），调值 55。mɔ⁷⁸ 与“枚[mɔ⁵⁵]”在调类上同为入声调，且调值相同。再者，海口话无ə韵。临高话的mɔ³进入海南闽语后，使用者选择了发音部位及听感上相近的ɔ或o来对应。

而“枚”的数目限制，很可能与合音语素的借入有关。*mɔ?*⁸ 与数词 *hə³/ə³* 合音后作为一个单位借入海南闽语，重新与数词“蜀”组合。该语素含有语义数量“一”，且由于其语义并未完全虚化，受此限制，海南闽语“枚”目前仍无法与“一”之外的数词搭配。

2. 有定“枚”的两种类型

沈冰（2021）认为海口话普通有定量名结构的形成，是语言系统内部的“省略”机制与“结构”压力共同作用的结果。海口话的有定“枚+名”结构有两种类型，其语音、句法分布、语义，特别是“枚⁵⁵+名”（B式）与普通“量+名”结构差异很大。因此有定“枚+名”结构的形成，并不是语言系统内部发展的结果。

钱奠香（2002:14）认为屯昌话的“枚⁵⁵”^①是“许”与量词“枚³³”的合音词。屯昌话的量词“枚”读为 mo³³，阳上调。但钱奠香（2002:25）指出，“当量词的声调是阳上调时，‘许’应省略不说”，因此不存在合音；即使合音，“许”与量词发生合音的条件和规律是“由前字‘许’的变调 55 做为起点向后字声调的最低点滑动”。例如（钱奠香 2002:24）：

- (35) a. 许³⁵⁻⁵⁵枝²¹³筆 > 枝²¹³⁻⁵¹筆 b. 许³⁵⁻⁵⁵日³²⁵井 > 日³²⁵⁻⁵²井

按照变调规律，“许”与“枚”合音后，“枚”应读为 mo³³⁻⁵³。而“枚”与名词搭配读为 mo⁵⁵，并不符合中昌话“许”与量词的合音条件和规律。

可见，“枚+名”结构的特殊性难以在海南闽语内部找到解释，我们认为这应该与临高话有关。从前文可知，语素 $mɔʔ^8$ 与合音语素 $mɔə^3$ 均通过语言接触借入海口话，有定“枚+名”结构也应分成两种情况来认识：①合音语素 $mɔə^3$ 对应“枚³³”，“枚³³+名”结构（A式）除了不能出现在句首外，其他句法表现和语义类型，与海口话普通量名结构表现相近。这个发展过程可能是，语素 $mɔə^3$ 进入海口话后，使用者将其视作一个量词，与其他量词一样，发展为表有定的“枚³³+名”结构。② $mɔʔ^8$ 对应“枚⁵⁵”，“名+mɔʔ⁸”结构与“枚⁵⁵+名”（B式）句法与语义功能相近，都能作主语、宾语等，无距离义，都不能用于对举语境。B式的形成，更有可能是复制临高话相关用法的结果，并且在此基础上有了进一步发展。

3. “枚”的发展

综上，“枚”无疑来源于临高话，但借入海南闽语后，不管是在数量（名）结构、指数量（名）结构，还是在量名结构中，“枚”都在海南闽语系统内部进行了调整和发展。具体如下：

①可搭配的名词范围有所扩大。*mɔ?*⁸ 在临高话中只能搭配无生名词，不能与人、动物等有生名词组合，“枚”无此限制。试对比：

- (36) a. 蜀枚箱国 (一个箱子) 蜀枚依 (一个人)
 b. tian¹mɔ?⁸ha³ 一个箱子 leŋ¹hun²na³/*mɔ?⁸ha³ 一个人
 箱 个 一 人 个 一

^① 钱奠香（2002）文中写作“坯”，为方便比较，本文统一写成“枚”。

②语序重排。临高话的修饰性成分倾向后置于名词。受汉语的影响，临高话出现了数量名结构、指数量名结构，但量词与名词组合时，仍保持“名+量”结构。海南闽语的修饰性成分一般位于名词前^①，量词“枚”不可后置于名词。*mɔʔ⁸* 借入海南闽语后，经历语序重排，“名+mɔʔ⁸”结构的语序调整为“枚+名”。

③语义虚化。临高话数词“一”与 *mɔʔ⁸* 的合音语素进入海南闽语后，语义上的限制导致量词“枚”一般不能与“一”以外的数词搭配。但随着“枚”的发展，语义逐渐虚化。在海南闽语的个别语言点，已经开始出现与其他数词搭配使用的现象。如在屯昌话中，“两/三+枚+名”为虚指，表量少（钱奠香 2002:56）。

四 结语

以往的研究大多关注海南闽语与临高话在音系特征上的相似性（刘泽民 2007；潘悟云 2009 等），较少关注临高话对海南闽语词汇、语法的影响。“枚”的特殊表现为语言接触提供了词汇、语法方面的例证。根据“枚”在海南闽语中的特殊表现与演变，可发现语言接触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动态过程。对于“枚”一系列特殊表现的关注与思考，可以得到以下启示：

第一，某一成分功能上的发展程度，只能作为迁移方向的一个参考，并不能作为决定性因素。从源语借入某一成分后，这一成分在受语内部会发生自变，在系统内部进行调整和发展，该成分某功能的发展程度甚至会高于源语。如源语临高话 *mɔʔ⁸* 只能搭配无生名词，而受语海南闽语“枚”所搭配的名词范围更广，既能与无生名词搭配，也能与有生名词搭配。

第二，语言接触的影响是双向的。郭必之、林华勇（2012）认为，语言接触的影响除了“高层→低层”，还可以是“低层→高层”。临高话与海南闽语长期接触，相互影响。刘剑三（1994）指出临高话中有不少来源于海南闽语的借词。而除了“枚”，海南闽语中还有不少从临高话借入的词汇，如：*na²⁴ku⁵⁵* “非常”、*ni⁵⁵niau²⁴* “轻佻”等。

第三，语言接触不仅发生在不同语言之间，还发生在同一种语言或方言内部，且语言接触的影响力存在地域上的不均衡。临高话对琼北闽语的影响力更大，随着距离的增加，其影响力逐渐下降。从“枚”在海南闽语中的分布与使用情况，可以推测出“枚”最早是从临高话传入琼北闽语中的，后由于北部的经济、政治影响力较大，在与南部进行交流时，扩散到琼南闽语中。其过程大致为：临高话→琼北闽语→琼南闽语。

参考文献

- [1] 陈鸿迈. 1992. 《海口方言的“坏”》，《语言研究》第 1 期.
- [2] 陈鸿迈. 1996. 《海口方言词典》，南京：江苏教育出版社.
- [3] 符其武. 2008. 《琼北闽语词汇研究》，成都：四川大学出版社.
- [4] 郭必之、林华勇. 2012. 《廉江粤语动词后置成分“倒”的来源和发展——从语言接触的角度为切入点》，《语言暨语言学》第 2 期.
- [5] 梁 敏、张均如. 1997. 《临高语研究》，上海：上海远东出版社.
- [6] 刘剑三. 1994. 《海南临高话中的汉语借词》，《中央民族大学学报》第 2 期.

^① 海南闽语有一些修饰性语素可后置于名词，如“人客（客人）”“鸡母（母鸡）”。

- [7] 刘剑三. 2009. 《临高语话语材料集》, 北京: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.
- [8] 刘新中. 2006. 《海南闽语的语音研究》, 北京: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.
- [9] 刘泽民. 2007. 《闽语和儋州话历史上的接触》, 《民族语文》第4期.
- [10] 潘悟云. 2009. 《吴语形成的历史背景——兼论汉语南部方言的形成模式》, 《方言》第3期.
- [11] 钱奠香. 2002. 《海南屯昌闽语语法研究》, 昆明: 云南大学出版社.
- [12] 沈冰. 2021. 《海口方言的有定“量名”结构》, 《澳门语言学刊》第1期.
- [13] 沈家煊. 1997. 《类型学中的标记模式》, 《外语教学与研究》第1期.
- [14] 王花. 2015. 《临高话量词研究》, 云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.
- [15] 辛世彪. 2013. 《海南闽语比较研究》, 北京: 商务印书馆.
- [16] 杨望龙. 2019. 《琼海话语法专题研究》, 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.
- [17] 张惠英. 1996. 《海南方言量词[mo]考》, 载詹伯慧、李如龙、张双庆编《第四届国际闽方言研讨会论文集》第299-307页, 汕头: 汕头大学出版社.
- [18] 张元生、马加林、文明英、韦星朗. 1985. 《海南临高话》, 南宁: 广西民族出版社.
- [19] Thomason, Sarah Grey & Terrence Kaufman. 1988. *Language Contact, Creolization, and Genetic Linguistics*. Berkeley & Los Angeles: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.

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lassifier *mo* 枚 in Hainan Min Dialect

SHEN Bing and LIN Huayong

[Abstract] The morpheme *mo* 枚 is a distinctive classifier in Hainan Min dialect, appearing in the numeral-classifier construction and the definite classifier-noun construction. It displays characteristics different from regular classifiers, such as a restriction on the noun-modifying numeral collocating with it and two distinct phonetic forms when occurring in the definite *mo*-noun construction. The classifier *mɔ?*⁸ in the neighboring Lingao language is similar to *mo* in Hainan Min dialect both in phonetic forms and functions. This article first presents a diagnostic description of the morpheme *mo*, and then on that basis, compares it with the classifier *mɔ?*⁸ in Lingao. It proposes that the classifier *mo* in Hainan Min dialect results from the linguistic contact of this dialect with the Lingao language, followed with subsequent evolution of this classifier in Hainan Min itself.

[Keywords] Hainan Min dialect Lingao language classifier *mo* 枚 language contact evolution

(通信地址: 518055 深圳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职业技术教育学院
510275 广州 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)

【本文责编 吴雅萍】